

学科报告

# 拉丁美洲研究的全球化

## ——东亚学者的参与路径与可能贡献\*

郭 洁

**内容提要：**东亚与拉丁美洲相隔遥远，然而，移民、经济和文化纽带以及漫长的历史已将彼此紧密相连。21世纪以来双方关系的不断深化，为相关研究议程提供了强大的智识与现实动力。尽管美国和欧洲是拉丁美洲的传统利益相关者，但并非拉丁美洲研究的唯一引擎。在拉丁美洲研究日渐全球化的今天，东亚的拉丁美洲研究学者面临着某些共同的挑战和责任，特别是如何看待与对待拉丁美洲研究的北大西洋传统，在全球框架的认知体系中增强作为“非西方”主体的身份或人文自觉，增强学术自主性，在长期结构化失衡中加入东亚视角或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对拉丁美洲多向度的理解，以推动现有研究范式的创造性发展。拒绝任何形式的主导叙事，是全球化时代从事地区研究的应有之义。拉丁美洲研究的“去中心化”改造突出了边缘地带在创建全球网络联结中的自主作用，而其相互间的联系与联通及其与传统攸关方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亦属并行不悖，都当被视为拉丁美洲研究迈向全球化过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拉丁美洲研究 全球化 东亚路径 “去中心化”

**作者简介：**郭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2) 02-0028-12

宽广的太平洋将东亚与拉丁美洲分隔两地，但也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它们打开了一扇扇交往的机会之窗。过去 20 年间，得益于双边经济关系的飞速发展、政府层面资助力度的加强，以及更广泛的求知驱动，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兴局面。日本和韩国与拉美国家也有着久远与现实的种种联系，两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同样具有深厚传统与鲜明特色。在拉丁美洲研究日渐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既非来自拉丁美洲亦非来自与该地区有长期利益相关性的欧洲和美国的东亚学者来说，从事拉丁美洲研究有何不同优势？我们所从事的研究能否对促进拉丁美洲研究的全球化有所贡献？上述问题颇具挑战性，答案不仅关乎作为东亚国家拉丁美洲研究者这一身份的正当性及所从事研究的智识价值，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对拉丁美洲研究的北大西洋历史遗产或现行传统的态度和处置，以及对全球框架和作为非西方主体的认知和自觉。

不可否认，迄今为止，国际学界拉丁美洲研究的主导权是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的，尤其是后者。作为传统利益攸关者，它们所倡导的理论、方法、议题等对全球拉丁美洲研究一直具有显著的引领和规约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观念、人员、商品的流动与互动，拉丁美洲研究的“去中心化”改造已越来越成为显性话题。但总体看来，拉丁美洲研究的“全球架构”仍是一种尚未充分实现的趋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在此背景之下，非西方世界、特别是本文所关注的东亚拉丁美洲研究应当如何自我定位并在此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深入探讨这一话题之前，有必要先就东亚国家（以下主要聚焦中日韩 3 国）拉丁美洲研究的历史与现况做一简要回顾。

## 一 跨越太平洋的接触与交往

相较我们身处其中的亚洲，与拉丁美洲“相遇”的过程常常会发现更多的惊喜，这主要归因于两地空间上相距遥远、文化差异大以及彼此间接触有限。虽说分居于世界各地的人对于异域的人与事总会自然生发出观察、研究、记述的兴趣，但由于相向而对、昼夜不同、寒暑互异，亚洲与拉丁美洲之间若非有现实力量的推动，要产生出深入了解对方的冲动也是不易之事。

就中国而言，据相关考证，中国与拉丁美洲在近代以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并未有过直接交往，真正的接触始于 16 世纪初，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以及达·伽马开辟通往亚洲的新航路之后。当时，欧洲与中国之间传统联系的主干道开始从大陆转向印度洋和太平洋，遂有了中国与拉丁美洲的间接接触，人员与文化联系亦在此后随马尼拉商帆贸易的增强而悄然生发。<sup>①</sup>到了19世纪，特别是1847—1874年间，据估计，先后有约25万契约华工通过厦门、广州、澳门等地被运抵古巴、秘鲁、圭亚那、牙买加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从事苦力劳动。华工的到来，不仅缓解了所在国的劳动力危机，亦为整个地区的种族和民族多样性做出了贡献。此后，伴随契约劳动体制的终结，自由移民逐渐取代了苦力贸易，带来了华人向拉丁美洲移民的第二波浪潮。墨西哥、秘鲁、古巴、巴拿马、智利等国均接纳了大批中国移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内地向拉丁美洲的移民大体处于停滞状态，其间该地区新增华人移民多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区。1978年以后，中国内地向拉美地区的移民再次出现快速增长。相较此前的华人移民群体，这些“新移民”在背景、身份、构成、移民目的、职业选择、社会融入等各方面均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多样性。从人数上看，目前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分布主要以南美洲和中美洲国家为主，如巴西、委内瑞拉、巴拿马、秘鲁、阿根廷、墨西哥、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苏里南等。

以上是人员的流动，从文字记述角度来看，明清时期大致可视作一个历史的节点。彼时，一些关于拉丁美洲人文、历史等介绍性文献开始出现。比如，明代熊人霖编撰的《地纬》一书，据称为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陈述世界的地理学著作。书中介绍了当时包括美洲在内的诸大洲地域划分以及各大洲相关国家的地理位置与风土人情等大致情况。<sup>②</sup>徐光启后裔徐朝俊于清朝嘉庆年间撰写的科技类先驱之作《高厚蒙求》第二集之陈述，就其所列的世界五大洲之一“亚墨利加”诸国，如“孛露”（秘鲁）、“伯西尔”（巴西）、“墨是可”（墨西哥）等，做了较前者更为详细的展述，亦为后人频频引述。<sup>③</sup>当前讨论甚多的中拉关系，多数以1949年为起点。此后至今，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联系与接触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性的特征。在第一阶段（1949年

① 罗荣渠：《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初）》，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第1—12页。

② [明]熊人霖著：《地纬》，清顺治五年熊志学《函字通》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③ [清]徐朝俊著：《高厚蒙求》第二集：海域大观，云间徐氏藏版，嘉庆12年（丁卯1807年）。电子资源参见 [https://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ni05/ni05\\_02158/ni05\\_02158.html](https://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ni05/ni05_02158/ni05_02158.html)。[2022-02-20]

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总体上较多受到了时代背景(冷战)和意识形态(革命)的影响;在第二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0 世纪末期), 伴随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与拉丁美洲各自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变迁, 改革与发展凝聚了彼此间关注并成为推进相互交往的主因;在第三阶段(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全球化与市场力量将中国与拉丁美洲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已成为多数拉美国家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伙伴国或之一。

同中国的情况有所相似, 东亚另外两大经济体日本和韩国, 与拉丁美洲的交往都与各自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紧密相连。

在日本, 与拉丁美洲的最初接触源于移民。人员的流动率先冲破了地理的阻碍, 将天各一方的彼此联系在了一起。1893 年, 132 名日本移民被一名美国经纪人从夏威夷带到危地马拉, 在当地咖啡和蔗糖种植园中做苦力。据悉, 这是日本移民抵达拉丁美洲的最早记录。此后, 为缓解人口对土地构成的巨大压力, 日本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向土地充裕而劳动力相较短缺的拉丁美洲输出移民。1897 年, 第一波由日本政府支持的移民队伍抵达了墨西哥。1899 年, 太平洋南岸的秘鲁迎来了首批日本移民。20 世纪初, 受巴西“咖啡繁荣”的吸引, 日本政府于 1908 年开启了对巴西的移民输出。据统计, 1908—1941 年间, 抵达巴西的日本移民人数高达近 19 万。日本人移民拉丁美洲的浪潮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 战后又重新恢复, 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这种旨在解决国内剩余劳力的移民政策才宣告结束。与此同时, 经济联系取而代之成为拉近日本与拉丁美洲关系最重要的纽带。此期, 日本开始从拉丁美洲大量进口能源、矿产品等工业生产原料, 以及棉花、咖啡等大宗农产品。原材料的进口标志着日本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与进口额同时获得快速增长的还有日本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日本海外投资存量中逾 1/4 流向了拉丁美洲, 主要集中在重型机械工业领域。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 出于保障海外资源供给的考虑, 日本对拉丁美洲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 涉及铁矿、大豆、铜矿、石油、铝矿、纸浆等各类存在进口依赖的产品。与此同时, 日本与拉丁美洲的融资关系亦通过银行借贷建立起来。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拉丁美洲经济遭遇危机与动荡, 日本经济亦于 20 世纪最后 10 年陷入停滞, 致使日本对拉丁美洲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和直接投资出现双下滑。此期, 日本与拉丁美洲的经济联系虽日渐疏离, 但一场新的“相遇”却同时生发出

来。1990年，为解决由于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修订了移民法，允许海外出生的日本人后裔赴日居留。这一变动直接带来拉丁美洲人口向日本的流动。在高峰时期，约有30万日裔拉美人移民至日本务工。近些年，由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总体趋稳及在全球价值链中重要性日增，加之日本国内经济复苏，双方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截至目前，日本已与墨西哥、智利、秘鲁等多个国家签有经济伙伴计划(EPA)，并已成为拉美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员国。不过，由于当前日本的经济结构已不同以往，其制造业的商业模式已从出口导向转向全球供应链管理，因而，从拉丁美洲获取大规模生产所需资源的兴趣已大幅下降，拉丁美洲现在更多被日本视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sup>①</sup>

相较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拉丁美洲的接触与交往起步较晚。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土面积有限、自然资源缺乏，韩国政府开始鼓励过剩人口向拉丁美洲移民，主要以从事土地开发为目的。1962年，韩国实施了《海外移民法》，是年底，首批韩国移民共103人启程前往巴西。此批移民多为城市中产阶级，包括商人、军官和医生等。以后直至1968年即巴西政府禁止农业移民之前，又先后有4批韩国人移民巴西。农业移民的另一个目的地是阿根廷。1965年10月，第一批韩国移民共计78人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1977年，又有约200户韩国家庭移居阿根廷。然而，无论在巴西还是阿根廷，韩国移民从事土地开发的初衷最终未得以实现。一方面是因为移民本身经验和资金不足，缺乏必要的农业知识、技能和设施；另一方面也与所在国农业生产条件与预期大不相同、农业政策不稳定以及城市就业机会的诱惑有关。结果，绝大多数韩国农业移民后来都搬到了城市定居。20世纪80年代以后抵达拉丁美洲的新移民多属投资移民，主要集中在服装生产、零售和批发领域。目前，在拉丁美洲的韩国移民共约10万余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巴西（占总数一半左右）、阿根廷、墨西哥、危地马拉、巴拉圭等国。拉丁美洲韩国侨民人数总体保持稳定，但地区内流动性很高。其中，经济和商业动机是推动其再移民最重要的因素，但文化价值观以及在移民社区内的宗教、家庭和社会联系等也是重要的驱动力量。除了移民这一纽带之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韩国对拉丁美洲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还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出于

<sup>①</sup> Nobuaki Hamaguchi, Jie Guo, and Chong - Sup Kim, *Cutting the Distance: Benefits and Tensions from Recent Active Engagement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Latin America*, Singapore: Springer, 2018, pp. 31 - 48.

对韩国现实政治的关切，期望从拉美国家摆脱军人政权重回民主轨道的历程中，寻找到对韩国具有借鉴意义的元素；二是韩国企业界对拉丁美洲这一重要的原材料进口来源地和有待开发的出口市场兴趣日渐浓厚。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拉双边贸易额获得了巨大增长。为进一步扩大出口并确保资源类产品的进口，自2004年起，韩国先后同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16年完成了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危地马拉6个中美洲国家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此外，韩国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在过去30年间亦有大幅增长，约占其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0以上，多数资金投向了制造业和采矿业，主要投资目的地为巴西、墨西哥和秘鲁。目前，电子产业是韩国在拉丁美洲投资的重点领域，三星集团和LG集团是两个主要的投资者。近些年，由现代汽车公司和起亚自动车公司引领的对汽车行业的直接投资出现了较快增长。韩国在巴西的投资主要为市场寻求型；在墨西哥的投资则受到了毗邻美国市场这一优势吸引，带有全球价值链合作的性质；对秘鲁的投资大多集中在能矿部门。<sup>①</sup>

从以上描述不难看出，移民与经济合作一直是连接东亚3国与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两个纽带，并将在日后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 二 地区研究的全球框架与东亚拉丁美洲研究者的角色

拉丁美洲研究是地区研究的一个分支。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冷战，共同塑造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地区研究，其主导范式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核心议程在于寻求对地缘政治区域和/或文明的具体社会生活模式的全面理解，用以满足美国的情报、军事和外交需求，为其政府政策提供参照。<sup>②</sup>

相较早先欧洲经验，美国的地区研究架构具有显著的协同性。在研究和教学中对当代政治、文明史或经济发展的关注程度不同，反映在不同学科的地位上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冷战使政治成为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的重点；南

---

<sup>①</sup> Kyeyoung Park, "A Rhizomatic Diaspora: Transnational Passage and the Sense of Place among Koreans in Latin America", in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43, No. 4, Winter 2014, pp. 481-517; Nobuaki Hamaguchi, Jie Guo, and Chong-Sup Kim, *Cutting the Distance: Benefits and Tensions from Recent Active Engagement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Latin America*, Singapore: Springer, 2018, pp. 51-73.

<sup>②</sup> 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9, No. 1, 1997, pp. 6-26.

亚研究也会涉及政治问题，但更注重文明和文化；新独立国家是非洲研究的关键主题；经济发展则一直是拉丁美洲研究的前沿和重心所在。同时，所有地区研究的各个分支又都有一个与现代化理念相关的、广泛的知识取向。地区知识被纳入并完善了学科分析框架，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结构，语言学习和背景知识系必要的研究工具。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继而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地区研究作为助力超级大国展开全球争霸的工具性意义逐渐减弱，研究目标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全球化的普遍意义，认为它将消除对国家或地区背景了解的需要。或如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SSRC）前主席克雷格·卡尔霍恩所说，对全球化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对特定区域和其他背景的关注为代价的。<sup>①</sup>

然而，冷战结束 30 年来，全球主义的单一规范以及以欧美为中心的正统范式似乎在持续不断地受到挑战与质疑。显然，对自由民主和竞争性市场经济的适应未必一定带来社会进步，那些限制社会进步的独特因素仍隐藏在“普遍性”之外。地区研究作为全球规范和地方价值之间的一个活跃的辩论领域，有必要加以重新定义，理想目标当是促成某种兼具学术性与多样性的自下而上（强调替代性与兼容非西方视角）而非自上而下（把主导规范作为一种独特模式强加于人）的全球框架。这一全球框架应该脱离单一的政治经济模式和学术上的北大西洋中心主义，同时拥抱异质性、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在此框架下，或如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教授滨口伸明（Nobuaki Hamaguchi）所说，东亚与拉丁美洲应更多从自身角度出发直接面对彼此，而非必须经由欧美传统范式或视角。<sup>②</sup>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关系日益多样化的世界里。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技术进步不断缩小亚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距离。拉丁美洲已越来越多地与亚太地区联系在一起。强调东亚身份，并非意指在拉丁美洲研究中刻意“去西方化”或“去美国化”，或者去挑战北大西洋传统的主导地位，而是要在演进中的全球架构下，本着主体意识和知识自觉发掘某些地区间或带有普世意义的共同议程。从具体路径上讲，可涵盖以下主要方面。

第一，推进东亚与拉丁美洲两地学者展开合作研究。东亚拉丁美洲研究

---

<sup>①</sup> Craig Calhoun, “Integrating the Social Sciences: Area Studies,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Problem-Oriented Research”, in Robert Frodem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disciplina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19 - 122.

<sup>②</sup> Nobuaki Hamaguchi, “Globalization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Intertwined Network”, in *As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34, No. 1, 2021, p. 165.

者的优势和学术贡献，最直接地首先体现在那些涉及东亚与拉丁美洲关系的议题方面，诸如移民问题，双边经济、政治与外交关系等。此外，也包括像秘鲁太平洋大学政治学教授辛西娅·桑伯恩（Cynthia Sanborn）所提及的一些更微观的话题，诸如东亚的非国家行为体对拉丁美洲社会与公共议题的参与或互动等。<sup>①</sup> 此类问题的研究，如果缺失了东亚学者作为“局内人”的参与，仅以单边叙事或“局外人”视角呈现，其缺陷不言而喻，反之亦然。除了上述双边议题，还有许多领域需要东亚与拉丁美洲的学者共同协作展开研究。合作研究的好处在于，通过伙伴关系与分工协作，双方学者可以将语言技能、文化理解以及不同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并由此衍生出创新思维或观点。然而，现状显示，尽管交流愈加频繁与广泛，但由于受主客观条件所限，合作研究的潜力远未得到有效释放。

第二，发掘并重新定位研究议题。简言之，即可从非西方的维度出发，依据自身知识议程和学术文化偏好，尝试突破现有框架，对由西方长期主导的议题和话语形成一定的平衡或补充。如果这是可能的，以下诸如此类的同质问题均不难找到各自的答案。比如，东亚和拉丁美洲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可以对全球非洲研究做出怎样的贡献？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亚洲研究学者可能在哪些领域对全球亚洲研究有所推进？非洲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学者能在全球拉丁美洲研究中发挥何种独特作用？等等。由此非西方视野出发，东亚与拉丁美洲确有许多超越单向度、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主题可供共同探讨与相互参照，诸如增长模式、国家治理、公共政策、区域一体化、地缘战略挑战，又如性别平等、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社交网络带来的革新与风险，等等。此种努力不仅有益于增进知识，提供有价值的比较维度，且能在跨地区和文化的各自经验中获得洞见。这对于正在全球体系中兴起并在寻求与这一体系共处或尝试改进该体系的国家 and 地区而言，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提供拉丁美洲研究的东亚视角。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仔细想来，也难免让人产生些许疑虑。众所周知，包括拉丁美洲研究在内的几乎所有地区研究都非常强调地区经验与学科的动态综合（即跨学科）的意义。对不同学科来讲，拉丁美洲研究的东亚视角是否存在或是否具有智识价值，可能答案是不同的。以拉丁美洲历史研究为例，可能东亚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就很难讲有什么特殊优势。毕竟，历史研究强调的是客观性，研

<sup>①</sup> 来自于笔者2021年11月18日对桑伯恩教授的邮件采访。

研究者身份或视角的不同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过,这一点或许适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但却不一定完全适用于诸如国际问题研究。尤其是在许多具有连锁互动特点的全球议题方面,或在某些具有跨地域比较或借鉴的共性问题方面,东亚学者还是能从自身的视野和经验出发,参与到相关知识的生产与创新过程之中。

### 三 通过交互网络构建推进拉丁美洲研究的全球化

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员、信息、交往、知识相互影响和碰撞的增长,凸显出构建与联通研究网络的意义。以东亚的拉丁美洲研究作为案例来看,各国本地网络、跨太平洋网络、东亚区域内网络以及更大范围地与全球网络的对接,均各有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拉丁美洲研究学界的网络联通可以首先从本地开始。本文所探讨的中日韩3国均有各自较成熟的本地网络,并已发展出自身拉丁美洲研究的一些独有特性。在中国,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中国拉丁美洲历史研究会、西葡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等有组织的学术团体构成了拉丁美洲研究者联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从出版和发表情况来看,研究议题时代感较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不同学科和领域;同时,除国别及个案研究外,关照地区整体发展动态的成果规模亦较突出,内容包括如拉丁美洲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城市化与社会保障,21世纪以来政治走向,拉丁美洲与大国关系,等等。近年,由于中国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纳入战略发展日程,加之中拉关系的现实发展需求,所涉学科领域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扩展。在日本,与拉丁美洲研究相关的学术团体主要有日本拉丁美洲研究学会(JALAS)、日本拉丁美洲研究社会科学协会(JSLA)、日本古代美洲研究学会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日本拉丁美洲研究的黄金时期。最近30年间,受经费不足、研究人员“老龄化”等现实约束,日本拉丁美洲研究整体实力有所下滑。同中国类似,日本的拉丁美洲研究亦多集中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但学人背景与涉及议题相较多元。从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学者对拉丁美洲经济问题有较为明显的偏好,日本学者则对拉丁美洲政治话题兴趣更高,同时在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亦有独到贡献,总体呈现出偏重国别和微观研究而非地区整体和宏观研究的特点。在韩国,较为活跃的拉丁美洲研究学术团体主要有韩国拉丁美洲研究学

会 (LASAK)、韩国葡语地区研究协会 (KALAS)、韩国西语研究者协会 (AHK) 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包括拉丁美洲研究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获得了政府层面越来越多的财政支持。进入 21 世纪后, 韩国政府的引导作用变得更加明显, 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地区研究发展的项目, 对带动拉丁美洲研究以现实议题为导向产生了可见的影响。政治、经济、外交动向、(新) 社会运动发展以及韩拉关系等, 是韩国学者涉及较多的话题领域。其他特点则介乎中国与日本之间。<sup>①</sup>

从事拉丁美洲研究, 面向研究对象建立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如今, 对于多数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东亚学者而言, 要做到这一点, 相较前辈们着实容易了许多。互联网通信工具的普及与应用, 总体趋于便捷的国际旅行, 加之可从不同渠道获得的研究支持, 使得物理距离已不再是相互交往与实地研究难以逾越的障碍。相近的学术兴趣, 间或辅以评估机制的激励, 促进了联合研究成果的产生。总体来看, 目前东亚与拉丁美洲之间跨太平洋的研究网络更多地仍以学者间、高校之间或相关机构间的联系以及偶尔三方间关联交叉为纽带, 尚未有共享的整合式学术平台成形, 似乎双方间本地学术团体的连接也处于基本缺失的状态。现有条件之下, 有望首先获得推进的, 可能是东亚的拉丁美洲研究网络与拉丁美洲的亚洲研究网络之间、而非与有明确学科指向的专业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平台合作。这种合作可以是不同层次间的, 抑或在交互层次间展开。目前, 拉丁美洲的亚洲研究平台既有地区层面也有国家层面的。地区平台中最具规模的当属成立于 1976 年的拉丁美洲亚非研究协会 (ALADAA), 总部位于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 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设有分部和协调人员。<sup>②</sup> 从国家层面看, 相关学术团体虽数量有限, 但颇具增长潜力。近年较活跃的包括墨西哥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国学术网 (Red ALC - China)、巴西中国研究网络 (RBChina)、哥伦比亚的亚洲—拉丁美洲研究网络 (Red Asia - América Latina) 等。同时, 还可考虑借助更成熟的国际亚洲研究平台如国际亚洲学者大会 (ICAS) 等, 与拉丁美洲关联网络平台建立起联系与合作机制。

如上所述, 中日韩 3 国的拉丁美洲研究表现出许多可供比较与借鉴之处。很长时间以来, 3 国虽在各领域交往甚广, 但拉丁美洲学人之间的接触却相较

<sup>①</sup> 参见郭洁:《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拉美研究》, 载《国际政治研究》, 2016 年第 5 期。

<sup>②</sup> 更多信息参见拉丁美洲亚非研究协会官网: <https://aladaainternacional.com/>. [2022 - 03 - 12]

有限，对各自的知识 and 研究议程也不甚了解。缺乏地区平台和有意识的推进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2014年，在3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东亚拉丁美洲研究网络（EANLAS）构建成形，其主要宗旨在于通过这一学术共同体平台的搭建和持续、有规划的学术活动的开展，将东亚地区拉丁美洲研究者汇聚起来，促进相互认知与交流，同时推进其全球化面向。过去近8年间，东亚拉丁美洲研究网络在上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打开了一扇了解与合作之窗，并通过这一机制将东亚拉丁美洲研究与世界范围的拉丁美洲研究连接在一起。如今，它已成为东亚和拉丁美洲学者交流与合作研究的一个常设平台。事实上，从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年会开始，东亚拉丁美洲研究网络就格外注意吸纳来自拉丁美洲的学者、外交官、记者、商务人士等参与其中。随后在日本、韩国召开的系列年会中，东亚拉丁美洲研究网络始终保持了这种向拉丁美洲同仁同步开放的多元对话氛围。除以会议形式延续交流外，未来或可考虑借助东亚和拉丁美洲学者所属高等教育机构的支撑，使其亦成为共同培养拉丁美洲研究者（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平台，进一步将双方研究力量和学术争辩整合在一起。希望这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新生力量对拉丁美洲这一地区产生学术兴趣并加入研究者队伍，抑或反过来，使更多的拉丁美洲青年一代带着好奇心和求知欲迈入亚洲研究的大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荣休教授蒂姆·尼布洛克（Tim Niblock）提醒说，东亚国家在拉丁美洲研究方面拥有的软件和硬件其实是其他亚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如若想在更大范围内带动整个亚洲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协作研究，或需东亚三国向其他亚洲国家的拉丁美洲研究者提供相应的帮扶与支持，特别是在建立与拉丁美洲的联系网络方面。<sup>①</sup>这一建议在实操层面颇有启发。

此外，东亚拉丁美洲研究网络也在扮演着连接东亚拉丁美洲研究与全球拉丁美洲研究的桥梁角色。近年，这一作用主要通过与全球规模最大的拉丁美洲研究学术团体——拉丁美洲研究协会（LASA）之间的合作来具体体现的。拉丁美洲研究协会成立于1968年，目前拥有会员1.3万余名，每年主办的不同主题的国际大会颇具影响力和吸引力，主要参与者多为美洲和欧洲国家从事拉丁美洲研究或跨地域比较研究的学者及相关人员。拉丁美洲研究协会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美国主导的色彩较为明显。最近10年间，这一局面开始发生变化。2010年，拉丁美洲研究协会首次选出拉丁美

<sup>①</sup> 来自于笔者2021年11月18日对尼布洛克教授的邮件采访。

洲的学者出任主席一职。2016—2020年，又先后有3位拉丁美洲同仁在选举中胜出，担当此职，并着力将这一学术共同体的网络切实向全球延伸，以推进拉丁美洲研究的全球化。东亚拉丁美洲研究网络与该协会的合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2016年，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当选主席、秘鲁天主教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尔多·潘菲奇（Aldo Panfichi）率协会工作组全程参加了于2017年年初在日本神户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东亚拉丁美洲研究网络年会，以及随后在京都大学召开的区域研究主题研讨会，并在会后实地调研了中日韩3国拉丁美洲研究本地网络实况。2018年5月，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第36届年会“全球化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研究”。其间，主席团全体会议围绕亚洲的拉丁美洲研究进行了主题研讨。<sup>①</sup>2022年2月，拉丁美洲研究协会与东亚拉丁美洲研究网络共同主办了自拉丁美洲研究协会成立以来的首届洲际年会（LASA/Asia Congress），借助拉丁美洲研究协会的大平台与东亚拉丁美洲研究网络在地区范围内的联通作用，此次合作对拉丁美洲研究协会自身的全球化、东亚拉丁美洲研究网络辐射力的拓展以及东亚学者在拉丁美洲议题国际辩论中参与度的提升都起到了切实的推进作用。<sup>②</sup>

#### 四 结语

拉丁美洲是受到美国持续影响的一个地区，与欧洲亦有着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联系，但它也是太平洋彼岸东亚国家的重要伙伴。欧美是拉丁美洲的传统利益相关者，但并非拉丁美洲研究的唯一引擎。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拉丁美洲研究的全球化都离不开包括东亚学者在内的“非西方”学者的参与和贡献。增强学术自主性，在现有的结构化失衡中加入“非西方”的视角或因素，不失为丰富拉丁美洲研究范式的一种努力。通过发展出对拉丁美洲更精微且多向度的理解，相信整个拉丁美洲研究学术共同体都将从中受益。拒绝任何形式的主导叙事，是全球化时代从事地区研究的应有之义。拉丁美洲研究的“去中心化”改造突出了边缘地带在创建全球联结中的自主作用，而其相互间的联系及其与传统相关方之间的交流，都应被视为拉丁美洲研究走向全球化的必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 王 帅）

<sup>①</sup> 参见 [https://lasaweb.org/lasa\\_archive/lasa2018\\_archive/index.aspx](https://lasaweb.org/lasa_archive/lasa2018_archive/index.aspx). [2022-03-12]

<sup>②</sup> 会议详情及日程等参见 <https://asia.lasaweb.org/asia2022/en/>. [2022-02-15]